

记忆中的家乡匠艺人

□ 张玉福

年过花甲,记忆中常会出现这么一群匠艺人:木匠、铁匠、石匠、泥瓦匠、毛匠、毡匠、奥皮匠、油匠、画匠等等,他们或带着简单的行头,走村串户,扯嗓吆喝,或安静地坐在自家的作坊中,沉醉于手里的匠艺活儿……他们看起来朴实无华,却个个身有一技之长。

包头东南方向沿黄河右岸的冲积平原一带,有一个叫“二偏营子”的村庄,建村历史约有一百六七十年的时间了。该村姓氏人家居多,最早居住于此的,叫张二偏,因此而得名。我记事的时候,大约是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期,村里大概有四十来户人家。村子南北长、东西窄,农户居住分散,稀拉、不规则。村子东邻店圪梁,西邻老右湾。村南有一条1959年修建的土质公路,叫“包准公路”(包头——准格尔旗)。那时公路上行驶的都是老式解放牌汽车,拉大炭的居多,也有去放包梁拉石夹砂的汽车。那时沿准各生产队用于拉炭的白拉套胶皮车。那时的交通工具基本都是步行,偶尔也能看到一些骑自行车的人,但就全公社来说,也没有几个人能骑上自行车。

村里虽说大,但总有一些耍手艺的人,比如画匠(缝皮匠)、黑皮匠、毡匠、木匠、石匠、画匠等。在那个农耕时代,他们是村里的能工巧匠,是村里的聪明人,没有他们,村里缺少了灵气;有了他们,村里也有了故事……

俗话说:“有手艺,好出门;艺多不压身;走遍天下饿不死手艺人。”那时候就知道邻村老右湾有一个做羊皮袄羊皮裤的黑皮匠,叫杨松。此人个头不高,但聪明精巧、性情开朗,能说会唱,小时候我们这些娃娃得知他给谁家缝皮袄、皮裤,总爱追前跟后听他唱山曲儿。凡是请他去做皮袄皮裤的人家,一进院就能闻到一股熬过羊皮的香味。冬天,见过皮匠把一张羊皮在

屋内檐子上吊起来,用一把半圆的明晃晃的铲刀刮那张羊皮的面子。那动作可谓“手舞足蹈”,提起蹬下,提起蹬下……很有节奏感。反复多遍进行铲刮,直至把羊皮整理得干干净净,炕上放一堆白乎乎的蓬松羊皮。

小时候觉得天很冷,记得我的爷爷每到冬天就那一身穿过多年的白茬皮袄皮裤,从未更换过。直到1976年我穿过那种斜对襟的老羊皮袄,不好看,但很暖和。

我们村里还有一个黑皮匠,叫张铁,是木匠的六爷。黑皮匠就是用牛皮、马皮、驴皮等制作生产队马用的马缰绳、马套绳、套绳、座套那些玩意儿,黑皮匠要有一定的手艺功夫,处理皮子,使用皮硝处理那些马牛驴的生皮子,臭不可闻,工艺程序非常复杂,所以,村里只有他一个老皮匠,因为一年四季做那些硬皮质的马套、马鞭之类的东西,一年四季地活儿就做得很少了。

小时候,如果能得到老皮匠编的一根小皮鞭子,那可真是太高兴了。村里的车伕们,每人一根,那根非常漂亮的小皮鞭子,坐在车轴上,鞭杆一甩,鞭子尖上的红绳一抖,尖利的一声脆响,刺破了天空,神气十足。我的六爷爷那时还是一个绳匠,就是那种用粗麻绳子的绳匠,粗绳子、细绳子、长绳子、短绳子都能做。生产队,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绳匠。纺织组有专门的工具,是许多人配合完成的一种劳动。小时候,每年,都见村里的几个老匠,在生产队的大院里纺绳子,这个营生在绳匠的指点下很多人都会做。

村里还有一个石匠,大人们都称他为“老石匠”,至于啥叫石匠,不得而知,好像听说是从山西大同那帮移民来的,村里人也称他为“老粉头”。原来人家石匠还会一门手艺,就是做山药粉条,一般人家的人都会做土豆粉条的,但“老粉头”是开好粉条作坊的,所以人这样叫唤。既



然是有小作坊的,所以“老粉头”的成分不好,反正记得在那个年代,他家是老好人,老匠多也是和顺脾气。老汉抽的烟袋锅子,烟叶子是自家种的,骂大邪乎,一般人抽不动。从小就记得“老石匠”拿一把锤子,一手拿个锤子,叮叮当当地敲,给村里磨坊里的石磨盘和磨坊里的石碾磨快被磨平的小坑,磨坊或碾坊黑咕隆咚的,尘土飞扬,扑鼻呛人。

那个年代,每个村里必定要有个木匠,没有木匠,村里劳动的一些木匠的工具修理就做不到;盖房子上梁架梁,做个简单的木头器物也不行,还得到邻村找木匠。我们村里倒是有个叫周二二的木匠,但他不是一个细作的木匠,就是他做会一些粗活的营生,因为没有跟过师傅,自学自干,这样的木匠,人称粗木匠。村里的这个木匠,过去主要是给村里修理制作一些劳动的木器,做不了家具。家具是家家户户的重要摆设,这是需要精良手艺的。

我们村在70年代初期搬来了一户木匠,姓周,陕西府谷人,在十里八村手艺是有的,只打家具,式样是新的,不过,因为手艺好,一般人家,请不到周木匠去做。光是在附近公社的各类干部、医生、售货员、名声大的人家,一年四季的活也做不完。周木匠可能是我们村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匠

人了,1972年我们家盖的土木结构做耳窗子房的所有木活儿都是他做的。

以前的乡村,房屋多是木架结构的,我们称作“架子房”。立柱、横梁、檩条、压柱,都是用木材。整栋房屋立起来,几乎不用钉子,全是卯榫结构,这很考验木匠的手艺,一般的木匠是拿不下来的。周木匠那是真正的师傅级别,负责测量、划线,然后交由手下的其他木匠和徒弟们各负其责。最壮观的是“立房子”的时候。除了木匠,主家还要请上很多乡邻来帮忙。房屋的架子经组装好,众人一起用力拉,把它“立”起来,安放在石料的地基上固定。最后,木匠师傅一验,严肃爬上房顶,祷告天地神灵祖宗,保佑主家一切平安顺利。斧头一敲,顺利合龙。这时,燃放鞭炮,主家给“喜钱”,然后摆上酒席,所有帮忙的人,亲朋好友,一起开伙,皆大欢喜。

我十来岁的时候,最好奇的还是木匠。木匠的工具,斧子、刨子、锯子,都喜欢的不行。木匠做木匠时,锯开的木头,用刨子推出的光滑的木条,白黄色跳动的刨花以及落松木头的香味都让我着迷。木匠也是吃香的手艺人,人家木匠都离不了,谁家不订几件家具呢?村里人把做家具叫叫家具,把那些木头木板锯断开,不就是割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拉特一带的农村,从事做这一行当的人不多。一个公社十几个大队,五六十个村子,全公社能出五六个“毡匠”也算为数不少了。毡匠们都不是专职,农忙时,他们和其他社员一样,在生产队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挣工分;农闲时,才腾出时间做毡匠。毡匠也不是每天都有,在没有雇主上门来雇用的时候,毡匠们就拉着羊皮到外村去,走街串巷扯开嗓子吆喝:“擀毡子嘛!擀毡子嘛……”来招揽生意。那年代,养羊的家庭不多。即使有养的,多则

五六只,少则一两只。一只羊一年剪一次毛,一次能剪二三斤,而擀一块六尺长、三尺宽的毡子,至少能剪十几斤羊毛。因而,能擀得起毡子的人家寥寥无几。毡子尺寸还有六尺宽的那种毡子,能擀半个炕,便称“半炕毡”。还有尺寸长一丈二、宽六尺的,能擀整个炕,便称“满炕毡”。如果哪个家庭铺有一块“满炕毡”,那这个家庭在整个村子里无疑是数一数二的了!

我12岁那年,我家养了有两只羊,积攒下了十几斤羊毛。请来本村毡匠,准备让他擀一块六尺长、三尺宽的毡子。擀制毡子这活计工序比较繁复。那次我亲眼目睹了毡匠师傅擀毡子的全过程,至今都记忆犹新。

首先,毡匠师傅将所用羊毛用一张一人多高的木方反复弹,直到弹得松软柔和了(至少得弹六七天的工夫),然后再将弹得松软柔和的羊毛铺在竹排上,洒上水,后用竹板拍打,拍打基本成型后,再用竹排卷起来。之后,便是最费力气工序了:毡匠师傅手脚并用,双手拽着绳索抽动,赤着双脚在竹排上上下下回蹬动,将水分挤压出去,再洒上水反复回蹬,让毡面更结实。一块六尺长、三尺宽的毡子,加班加点也得两天时间。毡匠吃住住在东家,可赚个零头。工钱嘛,毡匠尺寸计算:一块六尺的5元,中的10元,大的15元。

毡匠干得又是脏又是累活计,而且还是“费力不好讨”的营生,当地人有个“木匠走后三天,毛毡匠走后骂三天”这么一说,意思是:木匠走后,留下的是劈柴、刨花,那是生火做饭的佳佐料;而毡匠呢,留下的是满屋子的羊毛,每到吃饭时,饭碗碗吃出的也是羊毛,便要惹人骂了……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的生活方式、产品形式、生活观念不断更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当然淘汰掉一些旧的东西,但以前辈技艺生存的,那些人才,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回忆和思索。

桥

□ 郭文莲



从他的脚边滑过,多少次因为石头入水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她的衣裳。在寒风中,多少次河水灌进她并不够高的高鞋,有时鞋里的水满了,他就脱下倒掉,再穿上继续忙活。起先几天还没有自行车,爸爸只能早走步回来,干上一天活再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家,然后上班到深夜,第二天早起床回来。

桥架好后,爸爸要在上面走上好几天来回,试一下哪个地方不稳,就拿一块薄石子垫上,还要在上面故意晃上几晃,确认确实结实了,他才拿一把汗巾,放心地赶去单位上班。

当坚冰完全融化,春水流尽,河水小小。随着气温的攀升水温也逐渐上升,小孩子们更喜欢光脚下水玩水。桥架着高高的桥墩突兀地横亘在河面上,走的人渐渐少了,桥的作用也小了,爸爸也不再弹掉它。雨季来了,有时会有山洪,河水自然暴涨,在河水还没有漫过桥面的时候,桥依然可以应验渡人们走到河对岸。此外,爸爸实在也不好抽出那么多的时间专门去拆桥,除了上班,那个时候正是农忙季节,有点工夫还得做家里的活,妈妈毕竟是女人家,有些活需要爸爸回来一起做。总会有一场特别大的雨,引发出特别大的山洪,把爸爸辛苦搭建的桥冲垮。有时冲走几根桥墩,有时冲垮几个桥墩,有时一场大水过后,桥只剩下几个残破的桥墩,隐约只能看到一点桥的影子。等到来年,爸爸只好重新再建一座桥。

上学的时候,爸爸用汗水架成的,这座桥通向我的学堂,让我走向未来更广阔的世界。

另一座桥是爸爸的。小学毕业后,我去到爸爸工作的镇子里读初中,可以上山走路,也可以走山路,山路弯弯曲曲,爬上山,期间还要跨过几条湍急的小溪流,川路一平川,但也要四次渡过那些弯弯曲曲的小河。除非迫不得已,一般我不会选择走山路,因为山路远,陡,不说,还有点危险,有时路上一个

人也没有,会让我很害怕,怕狗,怕狼,怕莫名其妙的一些自己想象的东西。所以走路时除非小河发大水没过了才会有人的事。其实走路也不是说就万事大吉,步行约两小时的路程,半路上遇着几只野狗也不是什么稀奇的。还有就是变化多端的天气,平日里平静的日子,在春季开河或者雨季山洪爆发的时候突然会面临面狰狞,似乎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咆哮着一路前行,硬生生地把想要过河的人们挡在一边。但大多数时候,小河还是温顺的,就算是开河,在大部分冰块融化的时候,河水也会渐小,而在山洪较小时,小河也只是增加了水量,变得浑浊而已,如果在河里走路,或者穿上长筒水鞋,还是可以过河的。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春风伴着黄土地肆意地吹拂着大地,河里的冰块块你追我赶,推推搡搡地往前游,浑浑的河水溢满了河道,放学的时候我匆匆往家赶,刚出校门,爸爸骑着自行车追上来,他说你太大,我送你回家吧。我不用了,你送回去,返回来就天黑看不见路了。天黑不仅影响视线,而且水量也会增大,那样河水就有可能漫过爸爸的长筒水鞋到爸爸的肩膀。爸爸说今晚有月亮,走吧,快上车,我不敢多言,默默跳上爸爸的自行车后座。爸爸飞快地蹬着自行车,我紧紧抓住车座下与后座的连接处,一路朝前骑行。

到了河边,爸爸停下自行车,蹲下来让我爬到他的背上,他要背着我推着自行车趟水过河。我迟疑了一下,还是乖乖地上了爸爸的背,爸爸很高很瘦,虽然穿着厚实的毛衣,我还是明显感觉到了爸爸突出的肩胛骨,随着自行车的颠簸忽上忽下。我爬在爸爸的背上,从爸爸的肩头看下去,河里的冰块夹杂着浑浑的河水在爸爸的小腿中间直撞,有时一块大水滑过去,接着就是一股很急很浪的水流,浪浪地拍打着爸爸腿上的爸爸不由自主地打晃。有好多次,我想腿让我下来自己过河吧。有好多时候,我没有说话,我知道这样的话很苍白,也知道时间很宝贵,天就黑了。二米来宽的小河,我觉得走了很久很久,仿佛一直那么漫长,就现在回想起来,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在爸爸背上过河的那种情形。

从此,在我心里,爸爸的背就是一座桥,这座桥让我走进爸爸的心里,也把爸爸放在我心里。两座桥,爸爸用汗水、心血和爱为我架起了一段没有汹涌河水阻挡的人生之路,令我无法难忘。



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先后在伊金霍洛旗、达拉特旗任教三十多年,育人无数,收获荣誉无数,官至教导主任。在他四十九岁那年,国家第一年实行子女顶班政策,为了安排在家务业的我的二姐,父亲离开了他钟爱的教育事业,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如果他再上一两年,父亲就可以评上小教高级教师,工资还可以多挣千数块,但为了赶上这趟政策末班车,为了孩子,还是选择了退休,这让这一辈子都感到遗憾至极。

父亲在三十多岁时,因为肾结石做了肾切除手术,自此体质严重下降,待身体稍有恢复,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把一个蒙外乡镇的教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乡办主任,还是可以把家管好,孩子安排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像我们公司社的许多普通干部,孩子都在这个工厂,那个公社工作,还有去行政单位工作的。我家早在一九七四年就下了城市户,是团委书记的重点对象。不知是信息闭塞,还是条件不够,眼看着邻家富有的孩子们进城工作或就地安排上班,这让我们多么羡慕啊。每每遇到这种情景,母亲和父亲商议,是否也去城里跑一跑,父亲便默不作声,躺在炕上,闭着眼睛,连呼吸都那么微弱,最多一句话:组织上会考虑的。我们只知道,父亲为人正直,万事不求人,但内心是极其困惑的。

好在兄弟三人也都靠自己的努力升学读书参加工作,大姐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合同工,小妹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私企打工。只有二姐顶了父亲的班,自己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日子都过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父亲倒也欣慰。

父亲退休后,父母那点不多的积蓄还不够支撑我们全家在树林召那间里生外熟的房子,眼看着我和弟弟两个大不浪后生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老两口很是着急。起先包了农牧学校的亩地,但只能解决全家的蔬菜和猪肉,再后来到他退休的学校,拾自己学生用剩下的饭菜,多能贴补些家用。尽管省吃俭用,每年也攒不下几两银子。

有一天,父亲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的捆架上突

饼饼老爹

□ 林金栋

然多了一个废旧钢筋焊接的架子,里面装了一个纸箱,上面盖了棉布毯子,父亲瞅准了卖饼子的营生。我们谁也不同意,一来父亲的身体本来不好,每天驮上一个大箱子怕身体吃不消,二来骑车上路,有安全隐患,何况他的骑车技术也就凑凑乎乎。父亲是一个特别犟脾气的人,推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吆喝,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经过协商,父亲答应只给附近学校的学生买,也就一早上的时间。

那时,树林召街上加饼子的食品厂极少,父亲就去粮食局后面的副食品加工厂提货。由于人多,为了赶早,父亲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身赶往排队。尤其在十月腊月,不仅天寒,更是冷得要命,尽管父亲穿戴了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棉大衣,常常冻得浑身哆嗦。等急匆匆回到学校也已经七八点了,一群学生蜂拥而上,有交钱的,有赊账的,也有调皮的孩子趁人不备拿一个饼子走也没跑的跑了。父亲即便看见了也批评几句不作深究,孩子反倒不好意思了。

在夏天里,父亲又增加了汽水、冰棍、冰袋、雪糕等夏凉冷饮,因为物美价廉,供不应求,很是畅销。因为买卖不错,父亲兴致大增,剩余的时间竟将业务扩大到建筑工地、劳务市场和居民小区,“糖饼子……”“热饼子……”的叫卖声传遍大街小巷。每天晚上回家,父亲已是疲惫不堪,但还得清洗拖把、更换纸杯、准备零钱,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准备。当他把一堆杂七杂八的一块两块、一毛两毛的纸币硬币倒在桌上整理时,我们既为他高兴,也感到酸楚。

让我们担心事还是发生了。一天刮沙尘暴,父亲不听我们劝阻还是照样出去了,因为视线差,差点被一辆刚开过的汽车卷了进去。父亲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小腿也擦破,血流直淌,但仍然坚持完成了所有的饼子。回到什么也不说,只是我们才发现他一瘸一拐,才说出原来事,真让人唏嘘害怕。父亲依然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早又出发了。在两天的两天里,有无数人受伤,基本上就是那时时候受伤的,有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父亲因为卖饼子还有一个故事。一年,达旗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公安机关久侦未破,是警长请的公安局领导安排到穿行在大街小巷卖饼子的时候,父亲想到一个打工的后生好几天不见了,欠他十几块钱的饼饼钱。根据这一线索,不久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破获了此案,父亲立了大功,受到公安机关的表扬。父亲很高兴,为那个不务正业走向歧途的年轻人连连悔悟。

我和弟弟先后娶了媳妇后,父亲又卖了几年饼饼光荣“退休”。弟弟娶了两个媳妇为饼饼媳妇,我们则忘不了这个“饼饼老爹”。